

晋方言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乔全生

晋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分布于山西省广大地区以及河北、河南、内蒙古、陕西等四个省区临近山西的地区，分布在五个省区的 176 个县市，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晋方言的人口约 4500 万，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言、粤方言相当^[1]；晋方言区的人以山西省居民为最多，山西省内说晋方言的有 78 个县市，1900 余万人。山西省外说晋方言的有：内蒙古自治区有 28 个县市，700 余万人。陕西省有 16 个县市，200 余万人。河南省有 17 个县市，800 余万人。河北省有 35 个县市，900 余万人。晋方言在五个省区中，山西所占的县份、使用人口是最多的，晋方言的主体在山西，其他地区的晋方言与历史上山西移民或同属一个政区有关。

晋方言目前分作八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大同一包头）片、张呼（张家口—呼和浩特）片、邯新（邯郸—新乡）片、志延（志丹—延川）片。其中并州片是晋方言的核心地区，其次是吕梁片、五台片、志延片，其余是晋方言的边缘地区。山西省南部 20 多个县市今属中原官话区，称汾河片。^[2]汾河片在历史上与宋西北方言接近，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实际上汾河片是中原官话到晋方言的过渡区，尤其与晋方言核心地区并州片有较多共同点。据目前的研究，山西境内除晋方言外，还有中原官话汾河片、冀鲁官话广灵县一点。

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晋方言滥觞于 20 世纪初，此前关于晋方言的记录仅见于少数古文献的零星记载，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学界对晋方言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晋方言的研究迎来了较快发展的时期，成果斐然。21 世纪初期，晋方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确立了共时描写与历时探源结合的研究思路。近五年来，晋方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家级课题，出版了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但下一步晋方言做什么，怎么做，也需要讨论。本文将 20 世纪及其以前的研究作为晋方言研究的历史，将 21 世纪初期和近五年来的研究作为晋方言研究的现状，同时，对晋方言研究未来的走向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下分三部分论述。

一 晋方言研究的历史

1. 20 世纪 50 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1980 年以前）

西汉扬雄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记载以秦晋语为最多，且在语义的说明上也最细，有些甚至用秦晋语作中心来讲四方的方言。这是目前所见古代文献中晋方言最早记录。据濮之珍先生的统计，该书卷一、卷二所列秦晋方言最多，其中卷一列举晋方言 22 次，卷二列举晋方言 24 次。^[3]由此可见晋方言在汉代政治文化上所处的地位。晋代河东闻喜人郭璞曾用晋代的词语为扬雄《方言》作注，所注难觅晋方言踪迹。明清时期，多有文士在其论著中记录晋方言的语音和词汇词，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四记载：“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明代张位《问奇集》记载：秦晋红为魂、东为敦、中为肫。明代的袁子让《自学元元》卷八也记载：“秦晋读‘通’如‘吞’，读‘东’如‘敦’，读‘龙’为‘论’，读‘红’为‘魂’，盖谬东韵于真文也”。方本恭《等子述》卷首也记载：“有呼通摄如臻摄者，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以‘红’为‘魂’……”。清初傅山的《霜红龕集》、李渔《闲情偶寄》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自汉代以来，晋方言一直受到历代文士的关注。

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晋方言的,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4],上个世纪初,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Karlsgren, 1889—1978)利用在山西大学堂工作间隙亲自调查了晋方言的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大同、凤台(今晋城)、归化(呼和浩特)共7个方言点的语音。汾河片平阳(临汾)一点的字音材料散见于该书论述之中,其他7个点的3000多个汉字的读音则收入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方言字汇》里。这些珍贵的字音记录,反映的是一百年前晋方音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48年英国学者富励士(R. Forrest)《汉语》、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引用有关晋语的材料均参考和引用高氏记音。

20世纪30年代末,山西徐沟人(今清徐县)刘文炳用注音字母记录了徐沟方言,写出《徐沟语言志》。^[5]重点分析了徐沟方言的声韵调,列出了同音字表,指出了文白异读和入声现象。此外,该书还列出了分类词表,分析了词头、词尾的词法现象。是研究80年前晋方言并州片语音、词汇现象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20世纪50年代末田希诚先生执笔的《山西方言概况》(油印本)语音部分完成初稿,80年代又重新刻版油印。书中将山西方言分成4区,将语音总结归纳出11个特点,分别列出各区的声韵调对照表,绘出了22幅方言地图等。该书第一次大面积反映了山西方言语音的主要特点,是对山西方言全貌的一次初步调查和研究,为今后大规模的调查和描写晋方言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晋方言的研究。日本桥本万太郎发表了《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6]一文,该书通过对晋方言朔县、五台、汾阳、安邑(今属运城)语音描写和分析,并对声韵特征进行了分析解释和历时对应,对鼻音后带同部位塞音、安邑话与关中方言相近等特点也有详细论述。

2. 20世纪80年代的共时描写高潮(1980年—2001年)

20世纪80年代开始,晋方言研究迎来了大发展的辉煌时期,在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方言志丛书50余种,方言词典3部,论文集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0篇以上,并先后举行晋方言国际研讨会、音韵学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每年年末定期举行山西省语言学会年会,宣读和发表论文多篇。为广大研究晋方言的学者及同仁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培养了一支庞大的方言研究队伍。下文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研究成果,详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简要罗列有一定影响的论文。

1993年,由侯精一、温端政主持的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山西方言通志》的重要成果《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出版。这项凝聚几十位方言研究工作者心血、集当时研究晋方言之大成的成果,是这个时期晋方言研究的集大成者,标志着对晋方言的共时研究、全面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出版后在方言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全书共二十二章:一、绪论;二、山西方言概况;三、山西方言声母的特点;四、山西方言韵母的特点;五、山西方言声调的特点;六、历史音韵;七、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八、山西方言的词汇特点;九、山西方言的语法特点;十、山西方言字音对照;十一、山西方言词汇对照;十二、语法例句;十三、长篇语料;十四、山西方言地图;十五、山西方言的分区;十六、中区方言;十七、西区方言;十八、东南区方言;十九、北区方言;二十、南区方言;二十一、东北区方言;二十二、山西方言分区地图。附录一:山西方言地名特殊读音举例;附录二:山西方言研究论著目录。尽管书中存在调查人水平不一、取材详略不匀、编校尚有错漏、个别材料的可信度尚待核实等大型文献不可避免的微瑕,但作为研究晋方言及晋方言史的首要参考,对全面了解晋方言的特点及各片的语音系统,有较大帮助。

1999年,侯精一先生《现代晋语的研究》^[7]由商务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侯精一先

生从1980至1998年18年间发表的37篇论文,其中多篇先后在《中国语文》、《方言》、《语文研究》以及《晋语研究》上发表。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是晋语综述,包括晋语的归属、晋语区的形成、晋语的变读以及晋东南方言调查资料;第二部分平遥方言研究,包括语音研究、词语研究和语法研究。该书中多篇文章对以后的晋方言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2000年,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20万字,共十六章。该书是作者近20年来研究山西方言语法的结晶,大部分章节是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成果并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反映了国内方言语法研究领域的领先水平。是第一部研究山西方言语法的专著,填补了晋方言语法研究的空白。

这一时期晋方言的研究以共时描写为主,鲜有研究晋方言历史的成果。其中对晋方言语音的共时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白异读、入声的问题、连读变调等方面。文白异读是晋方言中部、南部重要的语音特点,侯精一《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93,)介绍了晋方言文白异读的概括,其后《山西方言调查报告》(第七章)(侯精一,温端政,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山西方言志丛书》(语文研究增刊,1982-1991)中也都有专门章节记录各方言文白异读现象。描写晋方言单点文白异读现象的论文有:李守秀(榆次,中国语文1980,4),田希诚、吕枕甲(临猗,中国语文1983,5),赵秉璇(晋中,语文研究,1994,1),李小平(临县,吕梁学刊1987,2),侯精一(平遥,语文研究1988,2),张益梅(介休,语文研究1988,4),潘耀武(清徐,山西方言研究1989,11),李改样、吴建生(永济,语言学论文集1990,2),桶口勇夫(闻喜,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2000),乔全生、吴云霞、孙玉卿(汾城,纪念李如龙先生论文集2002)、王临惠(临猗,语文研究,2006,4),此外,部分县志中的也有相关描写,如:张志荣(阳曲,1999)、高承谔(孟县,1995)、殷锡汉(永济,1991)、屈栋材(万荣,1995)、金恩梅(吉县,1992)、文登有等(稷山,1994)、李百玉等(临汾,2002)、洪洞县志编纂委员会(洪洞,2005)、李吉瑞(浮山,2002)等。

保留入声是晋方言的主要特点,也是晋方言分立于官话外的重要依据,历来都是学界讨论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晋方言入声的研究主要有杨述祖《山西方言入声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语文研究1982,3),潘家懿《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演变的历史》(音韵学研究1982),温端政《试论山西晋语的入声》(中国语文1986,2),王洪君《入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1990,1),马文忠《中古入声字在大同方言的变化》(语文研究1984,2),张益梅《介休方言的入声字和古入声字的比较》(语文研究1986,3),金有景《山西襄垣方言和〈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语文研究1989,4),贺巍《晋语舒声促化的类别》(晋方言研究论文集,1999),沈明《山西晋语入声韵的类型》(同前),李小平《从音系的辅音含量看晋语保留入声的原因》(语文研究1999,1),侯精一《晋语入声韵母的区别性特征与晋语区的分立》(中国语文1999,2)等。

对晋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除侯精一先生《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0,1)、《平遥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同上,1982,2)和《平遥方言广用式三字组连读变调》三篇文章外,还有:吕枕甲《运城方言连读变调的若干规律》(山西师大学报1989,3),孟庆海《阳曲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方言1991,1),齐仁《祁县方言连读变调》(语言学论文及集1990,2),江荫褪《朔州市朔城区方言的连续变调》等。

晋方言词汇研究主要集中在词头与词尾、古语词研究上。其中“圪”头词的研究尤为突出。对“圪”头词的研究不仅集中在各种词性的穷尽性描写上,而且还涉及地名等风物的描写上。如:宋秀令《汾阳口语中带“圪”音的词》(山西方言研究,1989),温端政《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1-6)(语文研究,1989-1991)等。其余词缀的研究如:陈庆延《说前缀“日”——晋语构词特点研究之一》(语文研究1999,4),赵秉璇《山西灵石方言后置

词“行”（语文研究 1984, 2）等，古语词的研究也初见成效。如：白平《元曲词语与山西方言证解》（山西省语言学会第三届年会语言学论文选，1983）、陈庆延《山西稷山话所见宋元明白话词语选》（语文研究 1984, 4）等。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晋方言的语法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大量对晋方言语法进行综合研究和专项研究的论文。综合研究晋方言语法的论文主要有：郭正彦《晋中方言的特殊语法现象》（语文研究 1981, 1），潘家懿《交城方言的语法特点》（语文研究 1981, 1），胡双宝《文水方言的若干语法现象》（语文研究 1981, 2），田希诚《临汾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语文研究 1981, 2），《和顺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5, 4），侯精一《平遥方言语法研究》（晋语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 1989, 3），李小平《临县方言的语法特点（一）》（语文研究，1990, 1），陈庆延《晋语核心词汇研究》（语文研究，2001, 3）等。

语法专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词、重叠式、语法结构等方面，主要论文简述如下：

（1）晋方言代词的研究：张延华（临猗，中国语文 1980, 6），杨增武（山阴，语文研究 1982, 2），吴建生（万荣，语言学论文集，1990），张光明（忻州，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 12），李改样（芮城，语文研究 1997, 4），任林深（闻喜，山西师大学报，1992, 5）等，乔全生在此基础上发表《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几个特点》（中国语文 1996, 1）。

（2）晋方言重叠式的研究：郭建荣（孝义，语文研究 1987, 1），侯精一（平遥，语文研究，1988, 4），潘耀武（清徐，山西大学学报 1989, 4），石巨文（长治，中国语文 1991, 5），张光明（忻州，方言 1992, 1）等，乔全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晋语重叠式研究》（汉语学报 2001, 3）。

（3）晋方言语法结构的研究：侯精一《平遥方言的动补式》（语文研究 1981, 2），胡双宝《山西文水话的自感动词结构“V+人”》（中国语文 1984, 4），王雪樵《运城话中的一种“把”字句》（中国语文 1986, 4），马文忠《大同方言的动趋式》（中国语文 1986, 6），乔全生《洪洞话的“VX 着”结构》（语文研究 1989, 2）、《山西方言中的“V+将+来/去”结构》（中国语文 1992, 1）等。

二 晋方言研究的现状

1. 21 世纪共时描写的深入与方言史研究初步探索（2002 年—2007 年）

2002-2007 年，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1999 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洪洞方言研究》^[9]为蓝本，本着“细致描写，科学分析，突出重点，不拘一格”的编写原则，作为晋语史研究的先期成果，出版了《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1-4）辑，该丛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平鲁（杨增武 2002）、武乡（史素芬 2002）、河津（史秀菊 2004），太原北郊区（崔容 2004），太原城区与郊区方言（郝小明 2004）、代县（崔淑慧 2005）、静乐（李建校 2005）、王利（长治县 2005）、蒋文华（应县 2005）、白静茹等（高平 2005）10 种。每种内容大致包括：地理概况、语音描写、历史音韵、词汇研究、语法专题等方面。列入重点研究的方言，其篇幅将比方言志扩大一倍，专题研究的内容将大大增加。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晋方言的平面描写更加深入和细致。

此外，日本学者樋口勇夫的《临汾屯里方言研究》（2004）由日本好文出版，语音记录非常详尽。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2002）对神木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细致透彻，值得借鉴。王临惠的《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除对语音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之外，对有些音变和词语也作了历史性的探讨。

这一时期晋方言共时研究的论文共发表 200 余篇,其中描写晋方言语音有: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平声调的类型及其成因》(方言 2001, 1),蒋平、沈明《晋语的儿尾变调和儿化变调》(方言 2002, 4),李建校《陕北晋语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山西方言声调的类型(稿)》(语文研究 2003, 2),孙玉卿《山西晋语入声舒化情况分析》(山西师大学报 2005, 4)等

研究晋方言词汇的有:沈慧云《山西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选释》(语文研究, 2002, 4),孙玉卿《大同方言的词缀“忽”》(方言, 2002, 4),沈明《山西方言的小称》(方言 2003, 4),胡双宝《山西文水话“圪”字小集》(语文研究, 2004, 3),白云《晋语“圪”字词研究》(语文研究 2005, 1),姚美玲《唐代墓志中所见晋南方言词语拾零》(语文研究 2005, 2),邢向东《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指示代词及其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 2)等。

研究晋方言语法的有:董育宁《山西晋语指示代词的几个特点》(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2, 6),郭校珍《山西晋语的疑问系统及其反复问句》(语文研究 2005, 2),邢向东《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反复问句》(汉语学报 2005, 3)等。

晋方言共时描写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晋方言史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最早关注晋方言史的是陈庆延,他在《晋语的源与流》(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晋南方言疑为晋语祖源方言说》(1999)正式提出了“晋方言史”研究的构想,但其后研究晋方言史的论著并不多见。2002 年,由乔全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晋语史研究》成功立项,标志着晋语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乔全生连续发表了《晋南方言管“树”读[P0]考》(中国语文 2002, 1)、《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一、二)》(方言, 2003, 2-3)、《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属关系》(中国语文 2004, 3)、《从晋方言看古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历史》(方言 2006, 3)、《晋语的平声调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 2007, 4)等多篇论文,引起了学界广泛重视,晋方言史的研究也日益繁荣。这一时期,学界陆续有多篇此类论文发表,如:崔淑慧《山西北部方言入声韵的演变》(语文研究, 2004, 2)王军虎《晋陕甘方言的“支微入鱼”现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 2004, 3),孙小花《山西方言果撮字读音历史层次之推测》(语文研究 2006, 2)韩佩玲《山西及其周边方言浊声母清化类型及历史层次》(语言研究 2006, 4),李小平《入声调在秦晋黄河沿岸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 2006, 4),李建校《陕北晋语知庄章组读音的演变类型和层次》(语文研究 2007, 2),王洪君《〈中原音韵〉知庄章声母的分合及其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 2007, 1),焦妮娜《晋城话中的入声字》(语言研究, 2007, 2),沈明《晋语五台片入声调的演变》(方言 2007, 4)等。

2. 近五年来的晋方言共时描写和历时探源的深入研究(2008 年至今)

近五年来,晋方言的共时描写范围更广,继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1-4 辑)出版之后,2009 年、2012 年该丛书第 5、6 辑先后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第五辑:包括汾西(乔全生, 2009)、平陆(李雅翠, 2009)、五台(孙小花, 2009)、浮山(余跃龙等 2009)、大宁(崔容等 2009)、孟县(史秀菊 2009)、浑源(白云等 2009)、永和(李建校 2009) 8 种,第六辑包括晋城及泽州(原慧艳 2012)、阳城(吴斗庆 2012)、右玉(吴玉芳等 2012)、朔城区(崔霞 2012)、绛县(张向真 2012)、晋北方言与民俗(孙玉卿 2012)、左权(白云等 2012)、王利(壶关 2012) 8 种。该丛书第 5-6 辑延续了 1-4 辑细致描写,准确分析的特点,在全面系统记录单点方言的全貌的同时,将平面描写和历史探究相结合,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民歌、地方谚语等,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现象,并与古代汉语、普通话以及邻近方言相比较,考其语言演变规律。该丛书的出版扩大了晋方言共时研究的范围,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吸引了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研究者加入到晋方言的研究中来,扩大了晋方言的学术影响。

近五年来有关晋方言共时描写的论文有 230 多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明《山西省

的汉语方言》(方言 2008, 11)、韩沛玲《山西方言中的非常态舌尖元音韵母》(语言科学 2009, 8), 吴建生《山西方言词汇的特点》(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刘育林《晋语词汇双音化的一种方式:加“圪”》(中国语文 2010, 1), 史秀菊《山西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表现形式》(方言 2010, 4), 《晋语孟县方言指示代词四分现象的考察》(语言科学 2010, 5), 汪平《祁县方言音系再研究》(语文研究 2010, 3)、沈力、冯良珍《用 GIS 手段解读混合方言的成因——以灵石高地为例》(语文教学与研究 2011, 9), 刘瑞明《晋语前缀“日”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 2010, 4), 史素芬《晋东南方言的“子尾”研究》(语文研究 2012, 8) 等。

近五年来, 晋方言的历时研究“异军突起”, 其代表作就是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该书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了晋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充分利用当代晋方言资料, 择取晋方言二十余条音韵特征, 广泛采撷和挖掘从晚唐以来反映晋方言历史的历代方志、文士札记、地方戏曲、民歌韵文、诗词用韵、及藏、梵、西夏、回鹘文与汉文的对音等大量历史文献中的有关材料, 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考其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 提出了“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见该书 35 页), 汾河片方言“反映的是宋西北汉语某方言”(见该书 36 页)的见解。该书利用历史文献考察一个大方言区的语音演变史, 在学界尚属首次, 填补了晋方言历时研究的空白, 为晋方言共时和历时相研究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为晋方言分立为汉语十大方言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证据。

《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研究》(乔全生、王为民著)是 200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研究》的最终成果, 该课题是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界限, 探索在推普工作的影响下, 晋方言语音的发展和演变。该书以高本汉 20 世纪初调查的八个方言点的方音为发端, 结合 20 世纪 60-80 年代调查的语音现象以及 20 世纪末期新调查的语音现象, 对晋方言八个点百年语音演变的过程进行纵向比较研究。通过每个点、每个年龄段选取 3-4 个点, 总共 60 个小点近 2000 个汉字读音的田野调查, 细致描写出晋方言八个点方音百年来不同阶段声韵调的演变情况及变化规律, 以管窥其历史演变的脉络以及不同方言点之间的相互影响, 重点探讨各个方言点方音不同时间阶段未变、渐变和已变的语言事实 and 变化原因, 并以此构建晋方言语音百年演变轨迹。该项目现已获“免于鉴定”结项, 著作共 30 万字, 由中华书局 2012 年出版。

近五年来, 晋方言词汇和语法的历时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山西大学史秀菊教授在晋方言语法共时研究的基础上, 开始探索晋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 她申报的《晋方言语法史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晋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011 年, 山西大学白云副教授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方言词汇史研究》获批, 晋方言词汇的研究也由单一的共时描写转变为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的逐步展开, 标志着晋方言的历时研究完成了一次大的飞跃。

近五年来有关晋方言历时研究的论文有近 60 篇,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李建校《陕北晋语古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音及演变层次》(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 3), 余跃龙、乔全生《文水方言声母百年来的演变》(语言研究 2009, 10), 乔全生、张楠《晋方言所见近代汉语词汇选释》(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0, 1), 秋谷裕兴、邢向东《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中与南方方言同源的古词语》(语言研究 2010, 2), 沈明《晋语果摄字今读鼻音韵的成因》(方言 2011, 4), 王为民、乔全生《山西方言与汉语语音史上的 tsi(-)类音节》(汉语学报 2011, 5), 崔容《敦煌俗文学所见山西方言的韵摄分合现象》(山西大学学报 2012, 3), 项梦冰《晋陕甘宁部分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 5) 等。

2007 年, 山西大学王为民首先对晋方言文献进行了整理与试点研究, 完成了国家语委委托项目《汉语方言已有成果整理规范——山西卷》, 同时也兼顾到湖北西南官话、河南中

原官话及其他方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0年，乔全生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成功中标，方言文献整理与研究迎来一个新的研究高峰。该项目要将前人留下的大批珍贵的汉语历史方言资料整理出版，使近代汉语方言文献不断发挥其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公器，有助于学术研究，有助于繁荣地方文化建设。为汉语史的研究、汉语语音史、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新的文献依据。

经过初步整理和研究，目前所见的反映晋方言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部：

(1)《等韵精要》，清贾存仁著，该书成书于清乾隆乙未(1775年)，是一部明清时期比较完备的韵图。它被认为是研究清代中期山西方言的重要语音资料，反映了山西境内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230年前的基本概貌。

(2)《马首农言》，清祁寓藻著。该书包括地势气候、种植、农器、农谚、占验、方言、五谷病、粮价物价、水利、畜牧、备荒、祠祀、织事、杂说等14节，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寿阳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书中记录了很多当地的方言词汇，包括一些“分音词”，为方言语音史、词汇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3)《霜红龕集》，明末清初傅山的诗文集。该书历经200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该书有关于当地方音变化的记载，有当地方音的无意流露，为追寻太原地区300余年前的方音特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4)《新刊校正方言应用杂字》，著者不详，是按义类标记晋中方言用词的字书。乾隆三十八年(1774)钤印。正文共收4200字(包括重文)，旁注约25000字。该书记录了当时使用的一批晋中方言词，揭示了200多年前山西晋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面貌，对研究晋中方言乃至整个晋方言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

(5)《徐沟语言志》记录山西徐沟方言的著作。刘文炳著。该书内容丰富。全书分四章，共约82000字。该书分析了徐沟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列出了同音字表，详细叙述了文(读字音)白(读字音)异读现象和当时新老两派的读音，所总结出的演变规律，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6)其他县志中的零星记载。清初至20世纪30年代近600种山西省县志中有20余种记录有本县的方言词，如《新修曲沃县志》(张坊修、胡承琢、徐储纂，1759)、《临晋县志》(王正茂，1774)、《赵城县志》(杨延亮，道光年间)、《荣河县志》(马鉴、王希濂修，寻銮炜纂，1881)等，20世纪30年代还有个别方志(如新绛)用注音字母记录了本地方音。

3. 晋方言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晋方言本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来研究晋方言的成果却很少。仅见侯精一《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中国语文》1988,2)，乔全生《山西“方言人名”里的原始崇拜遗迹》(《山西大学学报》1989,4)，高炯《山西理发社群行话外说》(《中国语文》1990,5)、潘家懿《山西人名琐谈》(《语文研究》1990,4)，潘家懿、李小平《山西的羊文化》(《语文研究》，1993,2)张光明《山西的牛文化》(《语文研究》，2001,4)曹瑞芳《山西方言“洋”族词语文化信息解读》(《语文研究》2007,3)等少数几篇文章。

近十年来，山西各界形成了关注晋方言和晋文化的时代热潮。1988年8月，由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全省性的社会学术团体“三晋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三晋文化研究会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编写出版《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和《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共计170余种，总字数达到了6400多万。目前，晋方言与晋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触及到山西的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方面。其中刘贯文主持校勘的《山西通志(清光绪版)》(中华书局，1990年)、刘贯文主编的《傅山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温幸、薛麦喜的《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正

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李元庆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年)、刘纬毅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李孟存、李尚思的《晋国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等著作在省内外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晋方言研究和晋文化的有机结合, 有利于晋方言本体的研究进程。

近五年来, 有近30篇论文是晋方言与民俗、晋方言与文化、方言亲属称谓的文章, 如孙玉卿《语音的发展变化与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 8), 王雪樵《山西方言中的特殊称谓》(文史知识 2008, 4), 张燕丽《山西晋南地域文化及民间音乐对蒲州梆子的影响》(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0, 3), 苏新星《山西方言中语言禁忌的文化心理浅析》(长治学院学报 2009, 3), 王利、史素芬《山西长治方言谚语的类型及其审美文化特征》(长治学院学报 2011, 8)等。2008-2009年, 乔全生及其学生在《太原日报》“龙城三晋”、“晋风晋韵”栏目连载的“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专题”系列(1-13)篇, 也是介绍和研究晋方言与晋文化的文章。

4. 晋方言本体研究的热点问题

自李荣先生^[10]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立出来, 分立为与官话同级的专区, 晋方言研究就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主要热点问题有以下两点: (1) 在晋方言是否应该从官话中分立出来。(2) 晋方言的历史可上溯到何时。下文简述其研究历史。

(1) 晋方言能否分立的争论

李荣先生1985年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首次提出, 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官话中分出称作晋方言。其后, 《中国语言地图集》^[11]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 晋方言是十大区方言之一区, 与其他九大区官话、吴方言、徽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粤方言、平话、闽方言平行。近三十年来, 学界对晋方言是否可以分立, 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不同意将晋方言分立为与官话平行的十大方言之一, 只同意作为官话区的一支次方言的有丁邦新^[12]、王福堂^[13]、李小凡^[14]。主张晋方言分立的有: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a), 《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1985b)、《汉语方言的分区》(1986b)、侯精一、温端政、田希诚《山西方言的分区》(稿)(1986)、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1986b)、《晋语研究十题》(1996)、张振兴《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1997)、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2002)、乔全生《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2003)等。两种观点的争论集中在晋语分立的标准是否单一、晋语入声与江淮官话入声性质是否相同上。

保留入声是晋方言分立的重要条件, 刘勋宁(1995)、丁邦新(1996)、梁金荣、高然、钟奇(1997)、王福堂(1999/2005)认为仅凭入声一条将晋方言分立, 理由不同充分^[15]。经过30年来的研究, 除保留入声一点外, 几位学者逐渐找到了多条支持晋语分立的标准。1989年, 侯精一在《论晋语的归属》(中国语言地图集·晋语图, 1989,)一文中提出了晋语的5个特点, 1996年又增至10个特点。在此基础上, 乔全生《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一)、(二)》(方言 2003, 2-3)文中总结了16条晋方言的与官话的非同步发展的特点, 为晋方言的分立提供了新的证据。

王福堂(1999)^[13]认为晋方言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过高。江淮方言有入声而留在官话方言中, 晋方言有入声, 却从官话方言中分出, 显然标准不一。对此, 温端政(1996)^[16]认为从入声音节上看, 不表义音节成系统地存在并在构词上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正是晋语入声不同于汉语其他方言入声的重要特点。张振兴(1997)认为“晋语的入声连成一片, 在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中显得非常特殊, 其形成原因和形成历史, 至今还不能做出满意的解释。而江淮官话的入声实际上只是吴语等南方方言入声地区的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人们往往把江淮官话区看成是非官话方言区和北方官话方言区的过渡地带。”^[17]乔全生(2008)对

此问题进一步研究,认为晋方言与江淮官话虽都保留入声,但是二者性质不同,首先,晋语保留入声大多有明显的喉塞音韵尾[·],而江淮官话的入声多已弱化,有些甚至丢失了喉塞尾。其次,入声韵类的分合关系也不同,晋方言大多两分,而江淮官话合肥两套,扬州则有五套之多。再次,入声调类分合关系不同,晋方言有41个点入声分阴阳,而江淮官话一般只有一个入声调。第四,晋方言无[-k]韵尾,而江淮官话北端还有[k],第五,晋方言通撮合口一等与合口三等入声字今读音有别,江淮官话无区别^[18]。晋语区和江淮官话处于官话与非官话的入声所处环境截然不同,无论是形成或是发展都不可同日而语。

(2) 晋方言的源头问题

关于晋方言与唐五代宋汉语西北方言间的亲缘关系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侧面触及。罗常培(1961)教授认为“现代文水、兴县、平阳及陕北安塞、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的读法“便是从唐五代沙州附近的方音一脉相传下来的”^[19]。虽然不能算是它们的直接后代音,但其间实在不无渊源可寻。湖南师范大学蒋冀骋教授认为“虽然兰州、平凉、三水、文水、兴县、西宁与敦煌有别,但同属西北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文水、兴县及陕西安塞、清涧今均属晋方言吕梁片。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在对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的比较之后,也认为“宋时我国西北地区和山西南部方言同属一个系统”。李如龙教授认为“唐宋时代秦晋方言的范围比现代晋南、关中、陇东、豫西要大”。

从历史上看,隋唐时山西的河东地区与西北地区地域上相连,政治上同属于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因而语言上也必然同属一个方言区。史书载:汉武帝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以后,出于扼守河西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汉王朝不断向敦煌移民,有名的大家豪族迁敦煌时带有众多的部属随从、佃户、工匠。自然也带去关中的方言。一直到唐五代,敦煌——沙州的方言,由于“全陕之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整个西北地区是颇具影响力的。这样,晋南、关中、敦煌古时的方言是相当接近的。陈庆延教授曾提出:晋方言的主源方言是关中方言。西周成王削桐为戏,后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当初来到今山西侯马一带的应是来自关中的移民。他们带到晋地的是古关中方言,可以推论周部落方言为晋方言的祖源方言。关中、晋南这两种方言直到现代层面上仍有联系也就不奇怪了。如果再考虑到周部落方言历史上一支向东过黄河到达山西西南部,再北上形成今天的晋方言局面,另一支向西扩展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那晋方言和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有共同点也就不奇怪了,同祖同源。不仅晋南与西北的关中联系密切,晋中、晋北与西北、陕北的联系也很密切。明末清初太原的傅山竟自号为“西北之西北老人”。可见,过去方言学界一直把晋方言归到西北方言系统,不无道理。

唐五代汉语西北方言的嫡系后裔就是现代晋方言。包括今山西、陕北等地方言。唐五代时的西北方言地盘较大,范围很广,西起敦煌、宁夏,东达陕北、山西。相当于唐时(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建制)的陇右道(东部)、京畿道(四邑)、关内道(大部)、河东道(全部)所在的广阔地区。与古“西北方言”的地理范围不同。西北方言当年所盘据的范围,其西半部丧失,而东半部仍保持。原来的西北方言,虽然地盘缩小、东移,但它的子嗣方言并未消失,这就是今天的“山西—陕北”方言,简称“晋方言”。可以说,现代晋方言的祖先就是唐五代时的汉语西北方言。它的远祖当是上古时期的秦晋方言,即以古晋国为中心的方言。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接继承者,千余年来,晋方言在继承的同时又经历着种种变化,然而,其主要特征却累千年而不变。

从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至今,晋方言的研究历史已有百年,其间发表和出版众多的论著,本文限于篇幅,仅择其具有代表性论著胪列与前,以飨读者。

三 晋方言研究的未来

自李荣（1985）将晋方言独立划分成为一个与官话方言平行的大区方言之后，晋方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目前，虽然晋方言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与官话平行的大区方言仍有不同的观点，但将晋方言独立划区之后发生的变化已经使得方言学研究获得了崭新的面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晋方言研究经历两次平面描写的高潮之后，进入了共时和历时研究并重的双线时代。如今，晋方言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汉语方言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这是我们研究晋方言感到欣慰的。但我们必须深思，晋方言研究的未来，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1. 晋方言分片方言史研究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晋方言是一个缺乏权威核心方言的方言，几乎没有一个方言能够作为晋方言的代表。以前大家都拿太原作为晋方言的代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一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记得我于 2012 年在旧金山参加北美中国语言学第 24 届学术年会（NACCL-24）期间，有个外籍学者拿太原方言的词汇与其他方言比较，结果认为晋方言的词汇与官话方言非常接近。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必须提出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么为什么晋方言缺乏权威核心方言呢？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这与晋方言被官话方言包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晋方言不是处在黄土高原之上，也许早就被官话方言完全覆盖了。比如，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区域是很广阔的，可是现在继承唐五代西北方言特征的主要在晋方言，唐五代西北方言的腹地，早已被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覆盖了。

如今，晋方言的大包片和五台片已经被北方官话侵蚀的面目全非，与官话方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比如，古全浊声母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就已经与北方官话方言完全相同了。那么大包片和五台片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这种类似并州片的底层形式呢？仅从共时平面出发我们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早期的晋方言，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都一律送气，但是北部区域已经被官话方言侵蚀，失去本来面貌。如果，仅从共时层面出发，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包括历史层次分析法），都是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

面对这个难题，我们只能依靠历史文献。我们期待在大包片和五台片能发现新的历史文献，从而进行大包片和五台片分片方言史研究。

再比如，平声不分阴阳是晋方言的一个典型特征之一。但这种特征主要集中在并州片，在其他片的分布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何大安（1994）、丁邦新（1998）、王临惠（2003）、乔全生（2007）都曾提出讨论。最近，王莉宁（2012）从“浊音成调”蕴含“清浊分调”的普遍性出发，认为晋方言“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阳平调值都很稳定，具备“浊音成调”和“平分阴阳”的条件，从而否定了连调分阴阳只是清浊声母对声调的零星影响而不是平分阴阳的证据的观点，从类型学角度肯定了晋方言的平声在连调中分阴阳是单字调曾经分阴阳的证据。这可谓是有晋方言平声不分阴阳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这是从类型学角度的推测，还有待实证。

最近王为民和张楚发现了一本有关阳城方言的韵谱《芸香斋韵法新谱》。根据《芸香斋韵法新谱》的记录，道光年间的阳城方言平声不分阴阳，可是现在的阳城方言平声分阴阳。阳城方言属于上党片晋城小片方言。现在晋城小片方言中，高平方言依然平声不分阴阳。阳城方言的个案说明，在清代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在道光年间，阳城方言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不存在“清浊分调”的条件。可是，阳城方言确实发生了重新的“平分阴阳”现象。这个个案说明，在不存在“清浊分调”的条件下，一个方言完全可以由平声不分阴阳，转变成平声分阴阳的方言。

阳城方言的历史表明，也许早期上党片晋城小片方言在历史上也曾具备核心晋方言的典

型特征，不过后来它在官话方言的侵蚀下，失去了早期的特征。

最后，我们提一个和语音史有关的例子。现在的呼和浩特方言山摄字已经完全合并，与北方官话方言完全一样。可是根据高本汉的记录，一百年前的呼和浩特方言与《中原音韵》非常类似，是区别“寒山”与“桓欢”的，如表1所示。

表 1-1 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一等字的读音状况

读 音 时 例 字	滩	残	干	看	寒	般	端	酸	官
	山开一 平寒透	山开一 平寒从	山开一 平寒见	山开一 平寒溪	山开一 平寒匣	山合一 平桓帮	山合一 平桓端	山合一 平桓心	山合一 平桓见
百年前	t'ã	ts'ã	kã	k'ã	xã	puõ	tuõ	suõ	kuõ
现代	t'ã̃	ts'ã̃	kã̃	k'ã̃	xã̃	pã̃	tuã	suã̃	kuã̃

表 1-2 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二等字的读音状况

读 音 时 例 字	班	山	盞	艰	谏	鰓	关	顽	湾
	山开二 平删帮	山开二 平山生	山开二 上产庄	山开二 平山见	山开二 去谏见	山合二 平山见	山合二 平删见	山合二 平山疑	山合二 平删影
百年前	pã	sã	tsã	tɕiã	tɕiã	kuã	kuã	vã	vã
现代	pã̃	sã̃	tsã̃	tɕie	—	—	kuã̃	vã̃	vã̃

百年前呼和浩特方言的读音格局与现代五台片定襄、忻州和五台方言完全一样，可是现代呼和浩特方言已经变得与北方官话完全一致。如果没有高本汉的记录，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呼和浩特方言曾经存在这种特征。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中原音韵》的“寒山”与“桓欢”分韵是周德清的向壁虚造，因为这种特征在北方方言中找不到任何痕迹。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而否定过去。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要充分认识晋方言的特性，必须进行分片方言史研究。研究各片方言的历史，看各片方言在历史上是否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解释晋方言之所以缺乏核心权威方言的必经之路，是考察晋方言除了入声之外是否具备其他共性特征的必经之路，也是认识晋方言与官话方言之间关系的必经之路。

2. 晋方言的阿尔泰化研究

颜之推曾提出当时的汉语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鲁国尧（2002、2003）曾由韵母入手对“南染吴越”进行半解，郑张尚芳（2010）则从声母角度尝试对“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进行初探。那么究竟什么是“南染吴越”，什么是“北杂夷虏”目前仍然是个谜，需要我们去破解。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说“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原’地区被金、元占领了三个半世纪，清又统治了将近三个世纪；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民族的控制下。”

乔全生（2008）指出“山西是草原到中原的必经之地，山西境内的方言必然受到阿尔泰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就目前看，语音上的调类锐减，语法上逆序结构，词汇上的‘底层词’，均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影响有关。晋方言的调类最少的只3个，中北部4个居多数。词汇上如可能源于蒙语的‘糊塌塌’等”。

由于晋方言历史及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晋方言成为考察汉语“北杂夷虏”的重要资源。作为晋方言研究者，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我们身上。

然而晋方言的阿尔泰化目前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这里也只能选择个别现象作初步的探讨。

2.1 塞擦音、擦音声母只有一套

今晋方言并州片和上党片方言中，塞擦音、擦音声母只有一套，要么是 ts、ts^h、s、z，要么是 tɕ、tɕ^h、ɕ、z。这一点与周围官话方言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特

点与蒙古语比较，我们就会立刻发现，蒙古语也有一套塞擦音声母。不仅蒙古语是这样，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都是这样，当然满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放在眼界，将这一点与东北官话方言相比，我们马上也会发现，东北官话的特点也大多是塞擦音只有一套，要么是 ts、ts^h、s，要么是 tʃ、tʃ^h、ʃ，有的甚至是 ts、ts^h、s 和 tʃ、tʃ^h、ʃ 混而不分。（不同的是，东北官话的日母字多读零声母）为什么这两处互不联系的方言都会出现这同样的特征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和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接触有关，无论是蒙古语还是满语，都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即 tʃ、tʃ^h、ʃ。

2.2 用重叠表示程度的加强

乔全生（2000）曾对晋方言的重叠式进行过探讨，指出有些晋方言用重叠来表示程度的加强。如“真真”要比“真”的程度强，“太太”要比“太”的程度强。后来我的学生调查晋方言，有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用重叠式表示程度的“级”，如：

红的 < 红红的 < 红红红的 < 红红红红的。

大家知道，四叠式多在闽南话里出现，北方的方言很少有这种现象。这是过去调查不够形成的印象。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为什么晋方言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那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我们会发现有意思的现象。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先把形容词的第一个音节单说一遍而在音节末增加（如果是开音节）或替换成（如果是闭音节）一个双唇音 b 或 p（或 m，w）。如根据力提甫·托乎提（2002）的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存在下列现象：

蒙古语：	ula:n 红的	ub ula:n 红红的
东部裕固语：	əra 黄的	əb əra 黄黄的
维吾尔语	qara 黑的	qap qara （黑黑的）
锡伯语	xatxun 咸的	xab xatxun （咸咸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词都表示程度的加强。这就与晋方言有共性的表现了。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这些词大都出现在表示颜色和形态的词中，晋方言也大致如此。晋方言的这一特点是否受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实这不仅是晋方言的特征，也是现代汉语的特征之一。

2.3 元音谐和的引入

汉语本来是不存在元音谐和现象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郑再发（2002）则以元音和谐为主要线索讨论了汉语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之间的界限，为我们了解汉语方言的元音和谐和现象提供了参考。不过郑再发的研究以音节内部的元音和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就与周围阿尔泰语言的元音和谐不同了。因为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元音和谐都发生在音节之间，我们一般将发生在音节内部的这种现象称为同化。

沈力等（2010）则用元音和谐理论解释了霍州方言的小称变韵现象。沈力认为，霍州方言的小称变韵遵循的是元音和谐律。如：（此处 f 表示 front；r 表示 round；h 表示 high）

词缀附加	元音谐和	词缀/韵尾删除
(1)p' aŋ ³⁵ （盘）-zɿ	→p' ε[+f]ŋ-zɿ[+f]	→p' εø-ø ⁵⁵³
(2)tɕ' iaŋ ³⁵ （钱）-zɿ	→tɕ' ie[+f]ŋ-zɿ[+f]	→tɕ' ieø-ø ⁵⁵³
(3)pau ²¹² （包）-zɿ	→pɔ[-f,+r]-u[-f,+r]	→pɔø-ø ³³³
(4)kəu ³³ （狗）-zɿ	→kɰ[+h,+r]-u[+h,+r]	→kɰø-ø ³³³

由（1）和（2）可以看出，当词干的韵尾为鼻音时，其韵腹元音被儿缀的元音同化，都同化为[+front]。由（3）和（4）可以看出，当词干的韵尾是元音时，其韵腹元音被其韵尾同化。[u]为[-f,+r]，是故[a]由[+f,-r]变成了[ɔ] [-f,+r]。（4）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4）中的[ə]没有变成[o]而是变成了[kɰ]，这涉及到一个音位学的问题。根据薛凤生（1986）

的观点，狗[kəu]的音位标音实际上应该是/kiu/，也就是说，中间部分是个高元音，而不是中元音。[i]的特征为[+h,-r]，与[u]的特征[+h,+r]不同，是故要变成[ɨ][+h,+r]。

以上这只是晋方言引入元音谐和现象的一斑，我们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3. 古西北方言研究

3.1 古西北方言的内涵

乔全生（2004）曾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当时主要依据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成果，挖掘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特征，并与现代晋方言比较，提出这个观点。乔全生（2008）则进一步提出，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无论是唐五代西北方言还是送西北方言，都是古西北方言。那么究竟什么是古西北方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 （1）古西北方言的区域
- （2）古西北方言的特征
- （3）古西北方言的历史演变

3.2 古西北方言与晋方言及其他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

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星教授在1982年发表的《汉语古音研究的过程和方向》一文中曾指出，上古汉语实际上有西北和东北两大方言音系。《广韵》以前的音代表西北方言音系，从周秦以来直到《广韵》，都是一个方言音系。虽分上古和中古，但都建都在长安洛阳，因此秦（晋）洛方言接近，形成上古的大通语区。东北方言音系又称燕代音系，这一支在上古没有势力，影响很小。直到晋代五胡乱华，匈奴鲜卑两大族从东北辽河流域入侵内蒙，再从和林一带，进入云中大同，后又入侵燕赵，先后经历燕、魏，统一北中国，东北方言才从此抬头。

朱星教授还指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因父亲太公喜欢幼子季历，至太公死后，因内乱逃至吴越蛮荒之地。先落脚无锡梅里，后建都姑苏。其口语实是周秦语。粤语是秦始皇迁北方五十万人守五岭逐渐形成，汉代赵佗又带去北方说周秦音的人到达此处。东晋避乱，大批氏族南迁，又造成客家话，所有这些都是西北方言音系。

我们认为，朱星教授的观点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晋方言与官话方言不同，而与南方的汉语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晋方言和闽方言都有匣母字读k的现象；都有鼻音带同部位浊塞音的现象；晋方言和吴方言在鼻音韵尾弱化及脱落，“支微入鱼”，指示代词三分，全浊正齿塞擦音读如擦音等方面有共同的表现。

现代官话方言基本上是以古东北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晋方言是古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因此从根源上说，晋方言和官话方言是两支平行的汉语方言。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晋方言和官话方言都是北方的汉语方言，但是两者的来源并不相同。

4. 研究方法的改进

4.1 实验语音学

众所周知，汉语方言的调查过去一直是口耳之学，晋方言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实验语音学已经成为语言学中比较成熟的语音研究方法，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有关晋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的刘莉李教授带领她的学生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和红艳（2008）《山西文水方言声调的实验研究》、范金武（2008）《太原话塞音、塞擦音、鼻音的声学分析及比较研究》、余延琳（2011）《绩溪、太原、福州方言元音实验研究》等。

由于上个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都十分注重方言音系的

描写。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语方言音素特征的价值，晋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如此。作为晋方言研究的重镇，我们计划建立自己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心，开展有计划的晋方言实验语音学研究。我们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心已经得到学校的支持，实验仪器和设备已经在购置过程当中。同时我们的一项有关晋方言实验语音学研究课题《山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话者识别研究》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总之，我们相信随着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晋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将获得长足的发展，晋方言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4.2 方言地理学

上个世纪，著名语言学家贺登崧先生曾经在桑干河流域进行方言地理学的调查和研究，完成了他的名著《汉语方言地理学》。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也曾在山西调查方言，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有很多内容涉及晋方言。之后，王辅世（1994）《宣化方言地图》，郭凤岚（2007）《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都采用方言地理学方言对晋方言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对某个地点方言进行研究，或对几个地点方言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见到对整个晋方言进行方言地理学研究的成果。

我们已经在并州片方言中开展以村为单位的细致的方言调查研究，计划以并州片方言为实验基地，开展大规模的晋方言调查，然后进行晋方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这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耗时耗力的研究工作，我们有信心在完成并州片方言的大规模调查之后，再进行其他山西境内的晋方言大规模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希望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各省的语言学者能携起手起来，共同进行这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与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合作共同进行以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为手段的晋方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目前也取得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我们计划将这一手段普及到整个晋方言的研究上来，进行深入的区域方言研究，探索晋方言的形成，晋方言与官话方言之间的关系。

总之，正如李荣在《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序》中所说的一样，“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

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在晋方言研究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晋方言的宝藏才露出冰山一角，晋方言研究还有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个以晋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工作者，我热诚的欢迎各位同好加入到晋方言的研究中来，共同开发这一“无穷无尽的宝藏！”

参考文献：

-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高本汉 2003 《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郭凤岚 2007 《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语文出版社。
何大安 1994 《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否可能》，《史语所集刊》第 65 本第 1 分。
贺登崧 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力提甫·托乎提 2002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李荣 1985 《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第 1 期，第 2-5 页。
李荣 1991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序》，《方言》第 2 期，第 81-82 页。
鲁国尧 2002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上）》，《中国语文》第 6 期，第 536-549 页。
鲁国尧 2003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下）》，《中国语文》第 1 期，第 137-147 页。
桥本万太郎 2008 《语言地理类型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乔全生 2000 《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乔全生 2008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
- 沈力 冯良珍 津村宏臣 2010 《用 GIS 分析山西霍州方言元音谐和律的衰退现象》，《中国语言学报》第十四期，商务印书馆。
- 王辅世 1994 《宣化方言地图》，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王莉宁 2012 《汉语方言的“平分阴阳”及其地理分布》，《语文研究》第 1 期，第 46-51 页。
- 王临惠 2003 《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薛凤生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郑再发 2002 《就韵母结构的变化论南北方言的分歧：官话方言元音谐和小史》，《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郑张尚芳 2010 《颜之推“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谜题试由声母索解》，《中国音韵学》，江西人民出版社，第 22-29 页。
- 朱星 1982 《古音研究的过程和方向》，《天津师院学报》第 1 期，第 83-89 页。

- [1]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2]侯精一、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D].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 [3]濮之珍.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M]. 缩印第 1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5]刘文炳. 徐沟县志[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6]桥本万太郎. 晋语诸方言の比较研究[A].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亚非文化研究[Z]. 1976-1977, 12-14 别册.
- [7]侯精一. 现代晋语的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8]乔全生. 晋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9]乔全生. 洪洞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10]李荣. 官话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5(1).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C]. 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 1987; 1989.
- [12]丁邦新.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3]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 [14]李小凡. 汉语方言分区方法再认识[J]. 方言, 2005(4) .
- [15]钱曾怡.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 [16]温端政. 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入声的特点[J]. 语文研究, 1997(4).
- [17]张振兴. 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J]. 方言, 1997(4) .
- [18]乔全生.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9]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1. 又见 1933 年史语所集刊甲种之十二.